

网络视听节目成传播主流价值新力量

前不久,以“守正创新,激发视听新活力”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四川成都举办。网络视听节目如何守正创新?清华大学教授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给出阐释:“主流价值可以被归纳为向上、向善、向美、向前4个方面。网络视听节目是否能够参与推动社会前进、发展、进步的过程当中,是一个重要的考量。”

小成本、大情怀、正能量特点凸显
近年来,在“小成本、大情怀、正能量”的创作原则指导下,口碑与影响力兼具的网络视听作品迭出。其中,《奇遇人生》《考不好没关系》两部作品凭借其创新性、真实性脱颖而出,成为2019年网络视听优秀作品的代表之作。

在“2019网络视听优秀作品深度复盘品鉴会”上,多位主创与专家学者共同分享了这些高分、高口碑作品的诞生过程。作为国内首档原创观察答题节目,《考不好没关系》每期有21组不同职业、不同收入水平、不同地域文化的素人家庭参与其中,通过主持人的现场催化,呈现12期不一样

的精彩内容,引发观众对于各种社会话题的讨论,深度聚焦亲子关系与教育理念。“通往成功的路径有很多,绝不只是考试。《考不好没关系》这档节目给人的启发是多元的,教育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分数,而是教导每一个孩子要真正成为有用的人。因此,这档节目看似是一个娱乐节目,却展现了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。”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副会长夏蒙说道。

无论是对真实感的追求,还是对创新的深耕,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都努力尝试在新的语态下“守正创新”,力求激发作品的新活力,从而成为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新力量。

网生纪录片成为产业新动能
2018年,新媒体纪录片生产投入占纪录片市场整体的23.9%,市场份额占18.9%。这个比例在2017年是15.2%和11.0%;在2013年前仅仅是3.5%和2.6%。短短5年,新媒体纪录片的发展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
本届网络视听大会上发布的《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》指出,“网络

纪录片吸引年轻受众,成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新动能”。为此,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结解读说:“2018年,各大综合视频平台加大纪实内容开发与投入,网络自制纪录片产量迅速提升,在影响力上已经成为可与电视节目比肩的重要一极,甚至在吸引年轻受众方面占据绝对优势,带动纪录片产业整体发展方向好。”

此外,互联网纪录片的高速发展不仅意味着传播渠道的变化,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加工方式、用户接受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变更。在这种环境下,纪录片搭乘新媒体平台的航船,展现出更加广阔而全新的传播方式和样态,而真正的新动能,也还在不断释放;真正的优质内容与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作品,正在互联网平台悄然兴起。

歌颂祖国和关注民生的佳作纷纷呈现
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,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很多议程都与此紧密结合。

与主题论坛同期举办的“2019中国网络视听创新发展”以“壮丽70年 奋斗新时

代”为主题,通过展览网络视听领域的优秀视听内容、创新集成平台和智能化技术产品等方面的成就,全面展示我国网络视听行业的发展成果,以崭新姿态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与此同时,大会专门设置了“网络视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——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”主题征集活动启动仪式。腾讯视频组织了“走进社网新时代—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腾讯视频精品节目观影会”,精选了包括电视剧、综艺、电影、纪录片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优秀代表作,全方位地反映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壮阔历史。

当前我国网络视听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与此同时,网络视听作为舆论宣传的阵地、经济发展的动能,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、国际交流的促进与合作等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如何坚持创作领域的“内容为王”是值得创作者思考的问题。“内容为王”不是口号,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,讲好中国故事,才能谱写出新时代的壮丽篇章。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养生汇

头部受外伤不可掉以轻心

很多人不慎摔倒时头着地,观察发现没外伤、没出血,也不头疼、不恶心,就以没事了。然而近日,笔者就连续为两例因脑外伤导致脑出血的患者做了手术。

75岁的吴大爷头部受了外伤,当时头部不痛,活动自如,没引起重视。吴大爷喜欢跳舞,每天都会去跳一会儿。脑外伤一周后,他照常出门跳舞。没想到,他在一次跳舞“摇头”后,突然发生喷射样呕吐,随后意识混乱,连家人都不认识了。吴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,经头颅CT检查发现,右额颞顶枕大面积硬膜下血肿,脑组织受到压迫。医生为他实施了右侧额颞顶开颅硬膜下血肿清除术。术中可见硬膜下120毫升黑褐色血凝块。医生清除血凝块后,可见脑表面的一条小动脉喷血,予以电凝止血,手术顺利完成。手术后,吴大爷恢复很好。

24岁的小杨前一阵开车时不小心造成头部外伤。当时,他只有耳朵上方的皮肤稍有挫伤,其余一切正常,因此没有重视。两天后,小杨开始出现头部不适、语言不清、头部晃动等症状,并伴有右侧肢体抖动,持续大约1分钟,5分钟后恢复意识。一天之内,他就发作了3次。脑外伤一周后,小杨的症状更为严重,急诊来到我院。术前诊断小杨为蛛网膜囊肿,脑外伤引发症状性癫痫。医生为他实施了左侧颞部切口钻孔穿刺外引流术,引出淡黄色液体150毫升,小杨恢复良好。术后待他血糖等指标控制达标后,再行囊肿切除手术,彻底解决病灶。

由此可见,脑外伤症状有时不容易表现出来,因为大脑颅骨非常坚硬,它掩盖了内部的出血等病情。如果等到患者抽搐、呕吐才重视病情,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所以,头部受伤或者头部受到撞击的人,一定要到医院检查。

脑外伤后即使首次CT检查正常,也不能掉以轻心,如果出现嗜睡、头晕、精神状态不好等症状,一定要及时就医,随时复查CT。这是因为脑外伤患者延迟脑出血的情况也不少,特别是老年人及儿童发生较多。有的伤后3~4小时出现症状,有的则是10~15天才发病,因此千万别大意。

摘自《健康报》

小心“白色高血压”

如果一个人的脸色显得过于苍白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否患了贫血,而不会想到这种脸色与高血压有关。其实,在高血压家族中,有一种与贫血有关的特殊高血压,称为“白色高血压”。

高血压是由于血液在动脉血管内的压力增高造成的,而贫血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血液中红细胞相对减少的疾病。高血压患者会患贫血,贫血的人也可能患高血压。

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,“白色高血压”通常是肾血管性和肾性高血压的特征。高血压患者的心、脑、肾等器官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,肾功能受损会使肾脏产生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减少,从而导致贫血,发生“白色高血压”。

“白色高血压”一般较易发现,患者不但面色苍白,眼睑和指甲也常是苍白无光泽的。这种疾病通常有一个发展的过程,轻者多无明显症状,有的人偶尔会出现头晕、耳鸣、失眠、健忘、食欲减退;严重的会表现出浮肿、毛发干枯等征状。

摘自《江南保健报》

糖尿病不只是“吃出来的”

很多人说:“糖尿病是吃的热量太高了,超过身体消耗,才得上的。”“糖尿病是吃出来的”论调似乎已成共识。但最新研究表明,青少年如果夜间睡眠不足8小时,更有可能出现上腹部脂肪堆积和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,进而导致2型糖尿病。

该研究纳入了2011~2014年间615名10~19岁的青少年。研究人员测定了参与者身高、体重、血压和其他指标。通过参与者的自我报告方式,获取每晚睡眠时间等相关信息。

研究结果显示,参与者平均每晚睡眠时间为7.9小时。有257名参与者平均每晚睡眠时间少于8小时,相比睡眠时间更长的人群,他们的年龄稍大、体重更重、腰围和颈围更大。此外,每晚睡眠时间少的人群,其胰岛素敏感性更低,特别是长时间的每晚少睡两小时的人,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要增加。

不同年龄、性别和性成熟阶段人群,所需睡眠时间不一样,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年轻人,为了避免未来糖尿病的发生,每天需要有9~10小时的睡眠。

摘自《中国家庭报》

滴水藏海

无人需要的数字

爱尔兰作家伯明罕年轻时曾在的一所乡村小学做过多年的教师。那所学校既偏僻又破旧,校舍是由废弃的农场改造而成的,学生最多时也没过百,一片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的空地是孩子们课间嬉戏玩耍的乐园。加上伯明罕,学校共有三名教师,这两名教师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艰苦和荒凉,相继离开了学校,只留下伯明罕这唯一的教师兼校长坚守在学校。

伯明罕有一颗爱孩子的心,将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学生,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他吃住都在学校,环境恶劣,条件艰苦,除了学生,一年难得见到几个人,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,最令他受不了的是,每年他都得几次徒步40里地到当地的教育部门送各种报表。有些报表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,毫无用处。比如有一个报表要求每个学校每年报送一次校舍的面积,自从伯明罕来到这个乡村学校,校舍面积从来就没有过一平方米的增城。伯明罕有一次负气地拒送这张表格,没过多久,教育部门就派人光顾了这所几乎被人

遗忘的学校,警告伯明罕说,如果再不按时报送他们所要求的各种报表,他们将关闭这所学校。从那以后,伯明罕虽然心中充满不满,但再也不敢怠慢。

前几年,伯明罕都是如实地填写那个不变的数字,表格送上去后就如同石沉大海,再无任何反应。这一年,伯明罕突发奇想,决定变化一下数字,他将校舍面积乘二以后得出的数字填在了报表上,报上去后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反馈。第二年,他将数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,仍然是没人理睬。此后数年,他都如法炮制,一次增加一倍,不断膨胀的数字丝毫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注意。直到有一年,伯明罕望着自己填写的数字,决定计算一下,如果自己的学校真有这么大面积校舍的话,那究竟有多大。计算出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,他上报的“学校”太大了,不仅远远大于圣保罗大教堂,而且远大于爱尔兰的任何一所学校,甚至还大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。

伯明罕暗自猜测,校舍面积

文化中国

警惕“无意义文本”书写

不久前,在“源流·时代——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”暨“绍兴论坛”上,与会学者思想交锋,观念碰撞,气氛活跃,出现颇多值得深思之处。其中,对“无意义文本”的认知与理解,及其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,再次引发广泛讨论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,伴随白话文兴起、书写工具更替,书法的创作、展示、功能等发生相应变化。近年来,书法创作中以表现主义为核心的视觉呈现与笔墨游戏,被更多的人接受,一些书家开始崇尚书写无意义文本,以抒发个体生命感受,并认为这样的书法作品更现代,而且能写出书卷气。

“无意义文本”真的可以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素材吗?以其为内容能够写出有感染力的书法吗?支持者认为,书法艺术应该具有独立价值,当代书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图式的拓展上,应该具备与文本没有关系的视觉审美价值。简而言

之,书法写什么不重要,关键是怎么写,强调的是书法的视觉艺术属性。反对者认为,“无意义文本”书写,重视视觉呈现,却无视书法创作规律,是对书法创作的矮化和贬低。文辞与笔墨割裂的书法作品,无法阅读,只能感受,令观者一头雾水,更难以从中读出书卷气。书法艺术与文学、文字学、篆刻学等密不可分。仅仅强调其视觉属性,显然失之偏颇。当下,书法创作中文辞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,反而应该加强;文辞与笔墨的关系,不仅不应割裂,反而应该和谐统一。

文本是书法的灵魂所系。书法的书卷气,以及艺术风格等,皆与文本背后的人文精神息息相关。文本缺位的书法,是不完整的书法。对于书法的价值判断,尽管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调整,但其文化根本并没有动摇。书法艺术一直承担着“载道”的功能。优秀书法“对于自身而言,足以陶冶人心,有‘修身’之力;对于社会而

言,则有移风易俗、感化人心之效”。以《兰亭集序》《祭侄文稿》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等为代表的书法经典,均是笔墨与文辞交相辉映的产物,其中蕴含着家国情怀、民族风骨、人文精神,体现着书家的文化修养与艺术素养,至今熠熠生辉。

对当代书法创作而言,怎么写很重要,写什么更重要。书法家马一浮先生曾为刊刻典籍而罄书筹资,却在《鬻戏老人鬻字刻书启》中明确表示“祠墓碑志、寿序、寿联、市招,一概不书”。即使身处困境,依然有所书、有所不书的坚持令人敬佩。这也说明,所书文本代表着书法家的人生理想、文化认同、文人风骨,不可轻视。

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都应从历史的广度、文化的高度理解书法及其价值。任何片面的理解,都会成为影响书法发展的认知障碍。辨清、拨开这些迷雾,树立正确艺术观,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书法作品。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生活新知

人脸识别让寻亲不再大海捞针

仅凭一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,能否找到被拐长达十年的儿童?目前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,其中在寻找走失儿童等公益场景中也开始担起重任。近日,广州市慈善会、佳都科技等共同启动了“人工智能+慈善”战略合作,创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寻亲平台——“AI回佳”平台。此次打造的平台既能进行人脸识别,提高寻人效率,也能模拟人脸成长变化。

“平台采用了多算法融合引擎,通过多算法同时对同一张照片进行多维度识别,能大大提高识别准确率。”佳都科技副总裁刘斌介绍,平台具备人脸识别和人脸模拟

算两大核心技术。前者识别率高达99.9%,每秒十万次的人脸比对,如在海量寻亲数据中运用将大大节省人力成本,提高寻人效率;后者则利用AI算法模拟人脸的成长变化,帮助那些失踪多年的家庭生成小孩成年后的照片,从而帮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寻亲。

“AI回佳”平台包括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端口,包括“随手拍”和“找家人”两大模块。随着身边疑似被拐儿童或乞讨儿童,热心市民可拍下照片,上传到“随手拍”页面,帮助孩子寻亲。寻找失踪儿童的父母可将照片传至“找家人”页面。上传到平台上的所有照片,在系统中只生成数字特征码,不会保留原图,且上传的照片仅开放给匹配相符的寻亲家庭看见,信息安全可以得到保障。实际上,“AI回佳”平台并非个例。已经有不少互联网公司把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拐拐寻人方面,启动了寻亲项目。如腾讯的优图人脸识别技术,已在福建省帮助警方找回走失人员1091名;今日头条成立“头条寻人”项目组;阿里巴巴与公安部合作建立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,上线“团圆”项目。今年5月,中央电视台《等着我》栏目报道了腾讯优图实验室借力AI,助力警方找回7名被拐拐超10年的儿童,让7个家庭破镜重圆。摘自新华网

名流故事

乾隆是位“书画痴人”

乾隆热衷于书画鉴赏,但水平有限,在书画作品上大量题跋、钤印更是为后人调侃甚至诟病。甚至还闹出过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收藏乌龙事件,令人啼笑皆非。

热表书画收藏

晚年自称“十全老人”的乾隆,在清朝是位战功显赫、治国有方、文韬武略的皇帝,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。

乾隆在许多书画名作上一盖就是七八十个甚至更多印章,把书画作品上盖得满满当当的,题跋也如同后世的“弹幕”一样在书画作品上“刷屏”。这一行为也让不少人觉得“完全破坏了书画清新雅致的品位”。

这也说明了乾隆是一位“书画痴”。乾隆十一年(1746),乾隆帝收藏到了“书圣”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,还有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以及出身琅琊王氏的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。乾隆开心得不得了,特辟养心殿西暖阁为“三希堂”,用来放这三件稀世珍宝,亲自题写匾额并撰《三希堂记》。乾隆帝对这三件宝贝高度评价,称它们是“希代墨宝之冠”,不仅在上面大量题跋,而且心摹手追,曾言“合临不下数十本”。

细细欣赏、反复临摹之余,乾隆还在书法上写上跋文,指责前人在王羲之真迹上题字,惋惜地表示这些题字破坏了《快雪时晴帖》的意境。此外,乾隆还喜欢在艺术品上盖章。据《乾隆宝笈》记,乾隆有印章1000多方,常用的就有500方,就像当下的女同胞喜欢收集不同色号的口红一样,任谁都阻止不了他对印章的狂热。当然,在一些人看来,乾隆这些加盖印章的行为其实也算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,它为古代书画的流传有序作出了贡献,还为古代文物提供了附加值。

两幅《富春山居图》

书画鉴赏其实需要很深的功力,在这方面乾隆确实算不得专业。不懂鉴赏的乾隆,免不了错把收藏的伪作当真迹,大臣们一同鉴赏时,看皇帝那么喜爱,哪怕看出了伪作的端倪也不敢道出一二。乾隆去世后,他收藏的许多所谓真迹被证明是赝品。其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《富春山居图》乌龙事件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是元代画家黄公望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,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。乾隆对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喜爱程度从满卷的题字就看得出来。画卷上的空白处几乎都被他写满了,这让乾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同一人在同一画中题跋最多的纪录。

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幅乾隆题满了诗词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竟然是个高仿。这幅《富春山居图》本是明代文人为了学习《富春山居图》而一比一临摹的作品,跟原作几乎是同一个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李步云:六点准时打鸣的“金鸡”

回首学术研究的这些年,法学家李步云自认为主要办了两件大事:最早提出依法治国、最早提出保障人权。如今,“法治”和“人权”都已被写进宪法。

在治学上,李步云觉得重在掌握分寸,认为不能保守但也不能太激进,要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。

李步云70岁生日时,他的一个学生做了一个“金鸡打鸣”的比喻,“公鸡早上要是5点打鸣就太早了,吵得主人睡不好觉,7点打鸣天已经大亮,没作用,最好是6点准时打鸣。”那位学生说李步云就是能在6点准时打鸣的“金鸡”,李步云对这个说法很满意。

1979年9月,李步云与人合写了《论以法治国》,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之后,首次有人提出应实行“以法治国”的方针。

从首提“以法治国”,到1999年“法治”成为共识写进宪法,李步云为此奔走呼喊了20年。“文章写得多的时候,一个月发表了10篇”,由于“李步云”3个字出现太频繁,《人民日报》专门给他起了个笔名。1999年修宪时,“依法治国”正式写进宪法。

2004年,再一次修宪时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,李步云又建议将保障人权写进宪法,引发了会场上的争论,不过最后“人权”还是写进了宪法。

经常成为各级领导座上宾的李步云,喜欢将自己遇到的“不平事”向上反映。2018年1月,他就

模子刻出来的。但后人为了牟利,将临摹者的题款去掉,伪造了黄公望题款,伪造的题款上说:“子明隐君将归钱塘,需画山居景,图此赠别。大痴道人公望。”意思是黄公望的好朋友子明将要回到钱塘了,子明想要画一幅山居的风景图,黄公望就把这幅《富春山居图》在子明离别之时,作为礼物送给了子明,这幅作品便被后人称为《富春山居图》子明卷。

乾隆对这幅画的真伪也起过一次疑心,但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作品的品鉴,而是来自于一本书对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记载,乾隆发现书中的描述和自己所收藏的这幅《富春山居图》有些出入:

有一天,乾隆在处理公务之余翻看《沈德潜诗文集》,发现沈德潜记录了一次自己看到《富春山居图》时的惊喜感受,还有对富春山居图的精细描写,甚至还写下了《富春山居图》上所有的名人题跋。乾隆再次拿出自己手中的子明卷对比欣赏,这一对比乾隆便发现了个大秘密,他发现自己手中子明卷的题跋竟然跟《沈德潜诗文集》中所记录的不一样。

乾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收藏了假画呢?不,自信的乾隆怎么会可能认为自己错了呢。于是,乾隆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:这两幅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确不一样,但这两幅都是真的,只不过是黄公望为富春山居主题创作的两幅作品罢了。乾隆还给这两幅图各自取了个名字,以示区别:一幅叫《富春》,一幅叫《山居》,加起来就成了《富春山居图》——“画痴”丝毫没怀疑过自己的品鉴能力。

真与伪

“书画痴”乾隆当然要把两幅《富春山居图》凑齐,于是他命人去打探沈德潜所描述的这幅画的下落,得知其被清代著名鉴藏家安岐收藏了。安岐祖上几代都为盐商,家资巨富,故而安岐本人自幼饱读诗书,喜爱鉴赏书画古董名作。

按说皇帝想要某幅作品也得旁敲侧击地找原藏家商量,但还没等乾隆爷张口,安岐家道中落,让他不得不把家中收藏的很多古书画拿来书画圈的达官显贵们品鉴。安岐接触到了乾隆的宠臣富察·傅恒,富察·傅恒自己并不喜欢书画,但他知道乾隆喜欢,就用书画顺势讨好皇帝,把这些作品给了乾隆。

可好笑的是,尽管乾隆将真伪《富春山居图》对比着看,但还是觉得伪作比真迹好,他继续在伪作上不断写着题跋,甚至每看一次都要用流水账一样的诗词在画面上感叹一番。乾隆至死不知他爱错了,之后很久才被人称“徐半尺”的徐邦达先生分辨出真伪。不幸中的万幸,恰恰是乾隆误把赝品当真品,才真真正正免于沦为乾隆“流水账日记本”的命运,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让浙江省高院“认了错”。

事情是其当律师的同学曹铮遇到的,2016年初,曹铮代理了温州一起寄血鉴定胎儿性别案,他发现当地警方对参与运输血液至境外鉴定的人员采取了刑事拘留,其后检方认为“非法行医罪”提起公诉,依据是浙江省高院于2012年制定的《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》。

在过去,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只是涉嫌行政违法,并非刑事犯罪。浙江省高院的文件显然扩大了非法行医罪的适用范围,曹铮将此告知了李步云。李步云曾参与起草了2009年的立法法修订工作,他清晰地记得,只有两高才有权作出司法解释,浙江高院的这一做法直接违反了《立法法》的规定。

2018年1月,李步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写信,对此提出审查建议。当年7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给李步云复函,浙江高院“承认了错误”,表示那份文件属于应该清理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,将商同省人民检察院、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关条款。

2013年,李步云设立了“李步云法学奖”。第六届“李步云法学奖”的国内获奖者是香港大学教授陈弘毅,2018年12月的颁奖典礼上,陈弘毅说:“李步云教授是我最尊敬的一位中国法学家,他在我国法学界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为我作为晚辈树立了最佳的榜样。”摘自《南方周末》